

新冠病毒危机中，中国媒体和公民发声的力量

cn.nytimes.com/opinion/20200206/coronavirus-china-news-journalism/

MARIA REPNIKOVA 2020年2月6
日

February 6,
2020



上个月，在北京的记者。Kyodo, via Associated Press

冠状病毒危机中出现的有希望的事情之一是，中国更敢说话的信息渠道和社交媒体上的新声音产生的创造性报道。为了刻画这个复杂的故事，记者和活跃人士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能力，有时还挑战当局对疫情的处理。

广告

但这些媒体是如何突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的呢？

中央政府也在危难关头故意留给媒体一些有限的空间，让它们来揭开失败的盖子。暂时的信息开放对政府有帮助：信息可以帮助政府找到问题的根源，把握公众的情绪，也可能让政府做出有效的回应，或者至少让政府展现出一种受监管的透明度的形象。

广告

另一种方法是，记者大量引用专家的评论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这让记者可以把自己与他们所传达的反对意见隔离开。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学者的高度尊重，把批评用知名专家的意见表述出来，既提高了批评的水平，也使其听起来更易接受。

《财新》有一篇报道几乎完全依赖专家的说法，暗示武汉官员推迟了发布有关疫情的重要信息——尽管他们的官方义务有含糊不清的地方，但推迟的做法是错误的。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份追究地方当局法律责任的案件梗概，但读起来并不给人这种印象。报道以两位北京教授的呼吁结束，他们建议修改现行法律，以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不幸。学者们用提出解决方案的方式说话，似乎不是在谴责，而是提供建设性的反馈。（至少一开始是这样：这篇报道后来被屏蔽了。）

就目前而言，冠状病毒危机的责任——就像以前其他的危机一样——主要落在地方官员的肩上。将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是更微妙的问题：首先，这可能很快引发审查和其他惩罚；第二个原因是，一般来说，越接近权力的上层，追究责任就越困难。西方记者会立刻批评中国整个政治体系的所有缺陷，但中国记者则倾向于避免笼统的评判，而是关注具体的犯错误者。

广告

也许可以说，冠状病毒疫情是中国首次“直播”的重大灾难，是参与者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做的“直播”。

但危难关头的批评性报道的窗口往往相当窄，它的开启和关闭也不可预测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官员实行的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所谓“谨慎的即兴之作”：他们的最终目的是社会稳定，当局试图在政治控制与精心策划的透明度之间寻找脆弱的平衡，在审查、宣传与允许媒体（或其替代物）要求追究责任之间摇摆。

很难说中国记者和关心此事的公民还能对这场危机进行多久的报道、提出多少尖锐问题。但值得记住的是，威权主义也是创造力之母。中国引导、压制或控制媒体的努力，已经产生了一些巧妙地、间接地避开了限制的非传统新闻来源。当局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到了这些来源。即使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，政府对来自人民的自下而上的压力——他们需要了解真相以及对问责的要求——仍然敏感，并会做出某种响应。正如冠状病毒疫情所揭示的那样，在中国，公众与党国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。